

香港第一份中文報紙



香港第一份中文報紙

多年來，我從報業史著及其他報紙、雜誌中，讀到不少記載，都說香港第一份中文報紙是《中外新報》，主持者是伍廷芳。事實上，外間的人亦多認為香港的中文報紙，是由伍廷芳首創的。

香港第一份中文報紙是於 1858 年出版，名字叫做《中外新報》，是沒有錯的，但是，創辦人是否伍廷芳，抑或還另外有人，那便值得談談了。

1853 年出版的第一份中文月刊叫做《遐邇貫珍》，是由懂得中文的英國傳教士編輯並主持發行，內容以宣傳教義為主，並錄點時事，由於有時事新聞，所以一般非教徒的人也購來閱讀，當時每份售價是港錢十五文，可惜廣告與發行都搞得不好，經過三次易主後，終於在 1856 年停刊，總共出版了三年。

當時，有一位倫敦傳道會的牧師東來中國，先在廣州學習中國語文。後來，他編了一本“中英字典”，交給香港《孖刺西報》排印，西報因此製了一副中文鉛字，等到字典印完了，中文鉛字便無“用武之地”。後來有人覺得可惜，便倡議利用這副鉛字，出版中文報紙，《孖刺西報》主人贊成。於是《中外新報》便由此誕生，時為 1858 年（咸豐八年）。



雖然只有三年壽命，《遐邇真珍》卻是香港中文報紙的雛形。



香港第一份中文報紙——《中外新報》



香港第一份中文報紙

《中外新報》最初是《孖刺西報》的附刊，隨同西報一起出版，好像今日的報紙“特刊”，隨報附送一樣。當時的《中外新報》，是採用書刊形式，隔日才出版一次。不久，因為在發行和廣告方面都有起色，便改為每日出版的四開單張報紙，而且一直出版了六十一年才停刊。我把香港第一份中文報紙《中外新報》的來龍去脈簡述過後，我們且來談談該份中文報紙的創辦人是誰，主持人是誰。

照理，《中外新報》最初出版，既然附屬了《孖刺西報》，則創辦人應是該西報的東主。不過，西報的西人不懂中文，而且出版中文報紙的動機不是西人，而是華人，所以應說動議出版《中外新報》和主持該報的人是誰，而不是說“創辦人”是誰，才較為合理。

動議出版和主持《中外新報》的人，到底是誰？據一般記載，都說是伍廷芳。

我曾獲得一份香港立法局第二位華人議員、太平紳士，又曾做過香港高等法院首位通事、首席華人陪審員、東華醫院倡建總理、考試法律委會委員、英華書院前任校長的黃勝（字平甫）先生的史料，閱後，竟對香港第一份中文報紙《中外新報》有新的發現。原來，與出版和主持《中外新報》有密切關係的人，除伍廷芳外，還有黃勝。

黃勝到底是什麼人，做過什麼事？請先看看他的簡史，然後再談他與《中外新報》的關係。

黃勝，字平甫，原籍廣東香山（現稱中山市）東岸鄉人，1828 年出生於澳門，1843 年來港就讀，肄業於灣仔摩利臣山馬禮遜紀念學校，1847 年隨校長勃朗赴美留學，在美國麻薩諸賽州孟松學校攻讀，學成返港，先後在《德臣西報》及《孖刺西報》工作，精研印刷技術及從事編輯翻譯，後轉入英華書院任教，繼任校長，與英國傳教士理雅各共同翻譯“四書五經”，對促進中英文化貢獻甚大。

1858 年，黃氏獲充香港高等法院陪審員，1860 年，與《孖刺西報》合作，刊行了香港第一家中文報紙《中外新報》。

那末，《中外新報》到底是伍廷芳創辦的，還是黃勝創辦的，這實在是使人疑惑的問題。

其實，伍廷芳與黃勝都是《中外新報》的工作者、主持者之一。如果以學歷、經歷、年齡來說——則黃勝的分量較伍廷芳為重，因為伍廷芳於 1842 年 7 月 30 日（道光二十二年六月二十三日）在新加坡出世，三年後隨父歸國，初居於廣州，到十三歲時才來港就讀於聖保羅書院。

1858 年《中外新報》出版時，伍廷芳年僅十六歲，而黃勝則是三十歲，以年齡、學歷、經歷而言，如果說黃勝創辦的可能較高，卻也不能因為伍廷芳年僅十六歲，就不能說他沒有創辦的可能。

《中外新報》到底是由伍廷芳想出來，還是由黃



香港第一份中文報紙

勝想出來？我無法考據。但照情理推測，由於黃勝的學歷、經歷，都比伍廷芳好，年齡又比伍廷芳大十四歲，加以處理編務的是黃勝，伍僅任翻譯員，則《中外新報》的創辦人，說是黃勝，其可能較大，最少《中外新報》是伍廷芳與黃勝兩人共同耕耘的，黃勝功勞，不能抹殺。

根據一般報業史書、報壇隨筆，都說香港第一份中文報紙《中外新報》創刊於 1858 年。但《黃勝平甫公簡史》卻說：“一八六〇年憑公學養與技能與孖刺西報合作刊行香港第一家中文報紙中外新報。”

究竟《中外新報》創刊於 1858 年，還是 1860 年？則有待稽考了。

據戈公振的《中國報學史》——中國有名的報學史書所載：

我國現代日報之產生，亦發端於外人，蓋斯時商務交涉日繁，其材料非雜誌所能盡載也。香港之孖刺報，於民國前五十四年（咸豐八年），即西曆一八五八年，由伍廷芳提議，增出中文晚報，名曰《中外新報》，始為兩日刊，繼改日刊，為我國日報最先之一種。繼之而起者，為西洋人羅朗也之《近事編錄》；《德臣報》（Daily Press）之《華字日報》……

《中外新報》為《孖刺報》之中文版，初該報因印刷《中英合璧字典》，曾購中文活字一副，旋從伍廷芳之建議，附

刊中文報紙，即延伍氏主其事。西人對於中文報紙之經營，當然非其所長，且在斯時，華人之有報紙，實為創見，辦理尤非易事；故名為《孖刺報》所有，實為華人單獨主持，所有一切營業權利，皆屬華人，而《孖刺報》只每年享有若干權利，以為報酬而已。……民國初元，該報攻擊龍濟光頗力（按：民國二年，即一九一三年，龍濟光繼胡漢民、陳炯明為廣東都督），為粵人所歡迎，銷數逾萬，為該報之最盛時期。然經理無力，財政非常竭蹶，乃加入新股若干。……

從戈公振所著之《中國報學史》，也說《中外新報》是於1858年出版，以後談報業史者，可能以此為根據，就筆者所讀過之有關《中外新報》的文章，也說該報是1858年創刊的。

但是，《黃勝平甫公簡史》則說它是於1860年創刊，到底《中外新報》之正確出版日期應為何時，如果能找到《中外新報》創刊號的影印本一看，便可分曉了。

為什麼許多記載《中外新報》事蹟的書本、報章、雜誌，都說該報是伍廷芳所創刊，我想：這與伍廷芳在清末，民初時的名氣有關。因為伍氏後來離港，入京佐李鴻章做事，民國以後，又做過外交部長，國務總理，廣東省長等要職，為國人所熟知，故人們一提起《中外新報》便把他的名字扯在一起，也未可料。

現在，且將《黃勝平甫公簡史》後段擇錄，以供



香港第一份中文報紙

讀者參考：

一八六二年，黃勝一度北遊上海，助製炮局丁雨生觀察研究製炮技術，將有關歐西製炮資料譯成為中文，並出版《火器說略》一書，一八六七年，遣子及幼子弟三人聯同前往英倫留學，十餘年間，成為一個華洋社會頗負盛名的通譯和出版家。

一八六九年，一批有地位的華商，籌組東華醫院，公是當年一位通曉英文並有頭腦的華人，遂被推舉為“倡建總理”之一，連續三任，直至該院落成。

一八七二年，公同好友王韜合辦中華印務總局，翌年在港籌辦創刊循環日報，同年，公被港督堅尼地爵士委為華人事務所委員，輔導歐人進修中文，並甄別他們的中文程度。

一八七三年，公又率領第二批少年赴美留學，在留學生事務所教習三年。返港後，為兒女完婚，並報得好友韋光之子韋玉（寶珊）為其快婿（韋寶珊是利銀行買辦，後出任立法局第四位華人議員，並封為爵士），一八七六年，公被任為考試委員會委員。

一八八三年，公入英籍，政府明令委任為高等法院通事及太平紳士，翌年，公又被委為法律委員會委員，寶雲總督並委公接替伍廷芳博士任立法局華人代表議員，直至一八九〇年退休（後何啟及韋玉繼任）。

一八八五年公協助王煜初牧師。籌建中國第一家自立，自養，自傳的教會“通濟會堂”，為籌辦長老之一（通濟會

堂即現時中華基教會合一堂的前身)。

一九〇二年，公積累成疾，屢醫罔效，與世長辭，享年七十七歲，遺下五子。

黃勝於 1828 年生於澳門，1843 年（時年十五歲）來港就讀於灣仔摩利巨山馬禮遜紀念學校，其時，香港割讓予英國僅一年（1842 年割讓），可以說，黃勝是香港開埠最初期的華人。我們讀《黃勝平甫公簡史》，有如讀了一篇“香港開埠七十餘年簡史”。在研究香港史上來說，此書實在有其價值。



報社被焚的《華字日報》

報社被焚的《華字日報》

《華字日報》於 1864 年（同治三年）創刊，為香港第二份中文報紙，最初由陳靄亭創辦，後來，他任駐美使館參贊及古巴總領事，遂將社務交由江治、譚奕翹和何仲生主理，不料何仲生接辦半年，報社不幸失火被焚，時為 1886 年之事，與創刊時已相距二十二年了。

經過這次大火後，何仲生主持的《華字日報》“另起爐灶”，自設廠房排印，從此脫離了《德臣西報》。

到了 1898 年，《華字日報》轉由陳靄亭之子陳斗垣接辦。是年，他因事赴滬，將《華字日報》報務全盤讓與該報編輯部同人賴文山、顧慶浦及潘蘭史等承辦。

潘蘭史在報界頗負盛名，曾受德國柏林東方學堂之聘。歸國後，先後主持廣州《廣報》、《嶺南報》等筆政，自接辦《華字日報》後，嘗著論劄政社會，主持清議，對當時港府擬設夜紙（即晚上外出，須要領證）及晨早查屋等事，著論力爭，指為擾民。

潘氏旅港十餘年，曾倡立戒烟會、不纏足會及仁義書棧等團體組織，以覺世變俗為己任，這在昔日社會，是驚世駭俗的。當時的讀者，或不敢公然響應，但私底下，卻是大加讚賞的。後來他因事脫離《華字

日報》，另創《實報》，對於中國立憲，及舉行新政事，尤能指陳利害，深切時弊。逾年，《實報》由於資金不足，不得已停刊。

《華字日報》創刊當年，也即是香港開埠二十三年後，那時香港人口只不過十餘萬人。到了潘蘭史離開《華字日報》，另創《實報》時，時約 1900 年，而香港人口也不過二十五萬左右。儘管那時的中國仍由清政府統治，但孫中山先生已奔走革命多時，港人對於革命思想已漸有認識，但一般人只是暗中贊成推翻滿清政府，和不滿香港政府部分的施政，所以對於潘蘭史的言論，亦僅止於心儀其人，暗為叫好而已。

《華字日報》雖然是一份很有歷史的報紙，但出版後數十年，因為香港及中國的報業尚未發達，所以內容甚為貧乏。直至 1912 年，清帝遜位，民國成立，香港、廣州的報紙，都是側重“社論”，也因此緣故，當時報紙最權威的人物是“主筆”，主筆就是一間報社的靈魂。

後來，《華字日報》聘請勞緯孟主持編務，他首先將副刊整頓，增加一些趣味性的小品，同時多刊載社會新聞。

在 1925 年，《華僑日報》與《工商日報》還未出版之前，《華字日報》與《循環日報》便是香港歷史最久的報紙了，該報一直出版至 1941 年香港淪陷為止。

《華字日報》的誕生過程，其實與《中外新報》很



《華字日報》最初是《德臣西報》的中文版

相似，彼此都是在一份英文報紙“脫胎”出來的。《中外新報》脫胎於《孖刺西報》，而《華字日報》則脫胎於《德臣西報》。

先是有陳靄亭者，此人中英文均佳，服務於《德臣西報》，見《中外新報》出版後，大受香港華人歡迎，他便認為：香港雖然被清政府割讓予英國，但香港人口百分之九十幾以上是中國人，出版華文報紙，實有其需要。於是與《德臣西報》負責人商量，由《德臣西報》代印及代發行《華字日報》，每日收取若干費用。

一切條件談妥之後，陳靄亭更得伍廷芳、黃勝等資助，出版《華字日報》。該報出版初期，僅為八開版一張（今日一般日報均為對開紙，昔日的小型報則為四開紙，八開紙者即是只有對開紙面積的四分一，可以說是“傳單式”的報紙了）。

《華字日報》初出版時的內容，也不過翻譯西報和轉載“京報”而已，所謂“京報”，就是刊載朝廷消息的公報。

後來，陳靄亭被清廷委任為駐美使館參贊及古巴總領事，《華字日報》編務改由江治接辦，並聘譚奕翹為翻譯，不久，譚接手該報，並與《德臣西報》簽訂了三年版權合約。

自譚奕翹接辦《華字日報》後，業務有起色，到三年合約期滿，《德臣西報》經理賓氏便要提高版權費



報社被焚的《華字日報》

和印刷租值，譚氏一計成本開支，認為加價後便無法維持，迫得放棄，改由何仲生接辦。後來，《華字日報》又落到陳靄亭之子陳斗垣手裏。

在今日看來，《華字日報》這個名字沒有什麼特別，但在當時，出一份《華字日報》供給華人閱讀，不讓英人出版英文報專美於前，未始不是一件愛華夏、愛華人的好事。

到了1912年民國成立以後，該報聘請勞緯孟入該報編副刊，他將“諧部”（當時稱副刊為“諧部”）改名為“精華錄”，刷新的內容除諧文外，增加了談叢、粵謳、歌謠與使部，大受讀者歡迎，銷路日增。後來，勞緯孟更出任該報總編輯。

到1919年，陳斗垣自置器材，脫離《德臣西報》，《華字日報》的銷路更有起色。

到1941年12月25日，香港淪陷，該報才告停刊。

1946年4月15日，《華字日報》在港復刊，但負責人卻是黎樾廷。誰知出版不久，因銷數與廣告均不符理想，於是求助於國民黨港澳總支部主任委員李大超，李允為臂助。

此時，黎樾廷忽謂要赴京公幹，候其歸來，始再訂立合作條件。據後來查悉，黎樾廷並未赴京，實仍在港，擬另覓新合作人。是時，有胡大愚者，擬在港辦報，黎氏乃將該報讓與胡大愚辦理。

《華字日報》遂於1946年6月10日復刊，社長之

名由黎樾廷而變為胡大愚，而報社人事，也大為變動。

當時，香港紙價日漲，胡大愚接辦《華字日報》後，收支難以平衡，加以與原註冊人（華字日報有限公司）手續未辦妥，故於7月1日又告停刊。

《華字日報》自該次停刊後，即未再出版。

該報在1941年12月8日日軍侵港前，是一份有歷史性的，同時也是一份辦得很出色的報紙，可惜因一場戰爭，使它停版了。

《華字日報》創辦人陳靄亭出版《華字日報》後，後來被清廷委任為駐美使館參贊及古巴總領事。該報先後由江治、譚奕翹、何仲生，及陳靄亭之子陳斗垣負責。

後來，《華字日報》發生大火，報社盡付一炬。經過這場火災之後，《華字日報》正式脫離《德臣西報》，自立門戶，加以陳斗垣悉心主理，《華字日報》業務遂蒸蒸日上，想不到日本侵港，成為它的致命傷。

香港重光後，陳斗垣後人無心再辦報，遂轉由黎樾廷，胡大愚接辦，可惜復版不及一載，即又停刊。



《循環日報》與王韜

《循環日報》與王韜

戈公振在《中國報學史》裏說：“《循環日報》，創刊於同治十三年之春（即一八七四年）。先是，有王韜（紫銓）者，以上書太平天國忠王李秀成之嫌，清廷欲得而甘心，乃隨麥華陀牧師走香港。旋應英華書院之聘，編輯《聖經》，遂家焉，迨歐海理牧師解散英華書院，王氏遂與該院買辦黃平甫（即創辦《中外新報》者之一的黃勝）集股購入，易名中華印務總局，此同治十年事也。後就印務總局改組《循環日報》。‘循環’云者，意謂革命雖敗，而藉是報以傳播其種子，可以循環不已也。王氏自任筆政，洪幹甫及其婿錢昕伯輔之。錢氏蓋奉《申報》主人美查之命，赴港調查報務以資倣效者也。初創時，新聞用洋紙印刷，船期尚用土紙（南山貝），新聞常佔篇幅三分之一，區為三欄：首欄選錄‘京報’，次欄為羊城新聞，又次則為中外新聞欄。然其時交通未便，消息難通，故主筆政者常須述野語裨史以補白。”

我們讀了這段記載，知道《循環日報》於1874年在香港出版，主筆政者是王韜。

關於王韜其人，外間甚至有人傳說他是“太平天國狀元”，且言論偏激，故為清政府緝捕，乃逃來

香港。

王韜由上海逃來香港是事實，至於他是不是“太平天國狀元”，則無可稽考，但估計這是訛傳而已。

香港新聞系名教授袁昶超所著《中國報業小史》對王韜與《循環日報》也有記載：

香港與廣州兩地得風氣之先，所以也很早便有華資創辦的報紙。一八七一年，即同治十年，香港英華書院宣告停辦，該院《聖經》編輯（紫銓）與友人梁仁甫及黃勝承購一切印刷設備，設立“中華印務總局”，於一八七三年春季創辦《循環日報》¹，這是中國人自辦日報獲得成功的最早一家，王韜也成為中國報界記者名聞世界的最早一位。

王韜是一個多才博學之士，因有上書太平天國忠王李秀成之嫌，不容於清廷，便於一八六三年避居香港，……

王韜，原名利賓，字蘭卿，江蘇甫里人（其地半屬吳縣，半屬昆山），父親是位鄉村塾師，家境十分清貧。王韜幼年多病，天資聰穎，童年即熟讀經史，於詩文無所師承，喜即為之，下筆輒不能自休，生平未嘗屬稿。

正因為如此，王韜從小便十分自負，目空一切，並

1 作者註：根據戈公振及袁昶超的說法，在指出《循環日報》創刊年份上，彼此各異，相信是由二人分別以陰陽曆作準所致。



《循環日報》與王韜



中國早期的現代報紙，在編排上頗受西報影響。如圖中出版於 1874 年 7 月 22 日的《循環日報》，其報名居中，便是一例。

且養成一派不羈的名士氣。

1842 年，鴉片戰爭爆發，英軍陷吳淞、上海、鎮江。王韜的忘年交蔣敦復關心國事，上書言兵，忤及當事者，官兵欲捕之，蔣大驚，削髮為僧，避於寺門。王韜因此事，對清廷更大表不滿。

鴉片戰爭後，上海成了通商口岸，江南農村，日漸凋敝，上海卻出現了畸形繁榮。1847 年，王韜的父親

改到上海設館。翌年，王韜至滬省親，從此，他開始進入了一個新的世界。

就在這一次的上海之行，王韜有了機會接觸到倫敦傳道會的麥都思博士——最早隨馬禮遜東來的新教教士。

他這一次的認識麥都思博士，對他以後在香港創辦《循環日報》也有很大的關係。

原來，馬禮遜、麥都思之東來，最初着重於文化方面，如編輯英漢字典、英文文法之類書籍，和把《聖經》譯為中文，組織印刷工場出版中文書刊等。第一份中文月報《察世俗每月統紀傳》，就是在 1815 年至 1821 年間，由馬禮遜、麥都思在馬六甲創辦的。

鴉片戰爭後，麥都思由馬六甲移居香港，編輯中文月刊《遐邇貫珍》。1842 年，上海開為通商口岸後，麥都思於 1843 年在上海建立墨海書館出版西書，宣傳西學，王韜曾往訪之，麥對王韜文才甚為賞識。

1845 年（道光二十五年），王韜十七歲，即以第一名的成績進入縣學，成了秀才。第二年他到金陵（即今之南京）應闈試考舉人，但是，到了金陵之後，他與友人買醉楚館秦樓，結果沒有考上。從此，他放棄了八股和秀才，一面抱着“讀書十年，然後生為世用”的雄心研究學問，一面仍舊過着酒色徵逐的生活。

如果當時的中國，還像明朝那樣，王韜很可能和唐伯虎、祝枝山一樣做了“風流才子”，但是，當王韜

還在故鄉讀書的時候，正值清廷腐敗，國力衰弱。

到 1849 年（道光二十九年）夏天，麥都思便正式邀請王韜到墨海書館工作。其時，王韜已經二十一歲，而其父同年在滬去世。

王韜在墨海書館工作了十三年，到 1862 年（同治元年）8 月，清廷以王韜上書太平軍，指為“通賊”，傳令逮捕。王聞訊，倉促離滬赴港。也因為這次的逃亡，使其後來在港創辦《循環日報》，聲名大顯，成為中國之著名報人。

關於王韜上書太平天國，清廷指其“通賊”，實亦是小題大做，胡亂入罪。雖然，王韜上書太平天國是事實，但是上書之目的，就是請太平天國不要攻打上海，以免滬地受到摧殘而元氣大傷。

王韜上書太平天國函中，有云：“曾國藩之踞安慶，乃真心腹大患耳。”王韜指出：“不集中兵力固守安慶，雖得志於上海，而千方爭上游之大局尚有所阻，此畹（王韜字畹蘭）所不取也。”所以他勸太平天國軍不要強攻上海。如此之函，又怎稱得上是“通賊”？

王韜由滬逃港，他找着了英華書院院長理雅各，他倆過去是由麥都思介紹而互相認識的。理氏對於王韜輔佐麥都思漢譯《聖經》之貢獻，尤為讚佩。此時，理氏正銳意將中國經典譯為英文，能得王氏相助，深感獲益不淺。



1867年（同治六年），理雅各返國，邀王韜西行，王於是年陽曆11月20日啟程，旅行四十餘日到達法國馬賽，從此便開始他在歐洲兩年多的生活。

這期間，他真是眼界大開，認為歐洲與中國之間，相隔幾乎有一世紀，這當然是指科學技術方面而言。

到了1870年春，理雅各接香港來書促其返港，重主講席，而當時中國經典的英譯還未告竣，於是王韜也回到了香港。

這時的王韜已由一個風流自賞的人物，變成了憂國憂時的愛國志士。他在英國時，曾寫信與妻舅楊醒逋，歷述自己一生思想的變化：弱冠時僅“思得一通籍，博庭內歡，他非所知矣”。考試不第，出外謀生，亦“但求得五百金，可作歸耕計”，從抵上海到歐洲，又經歷了三次變化，初變而為徵逐之游……直作信陵醇酒婦人想，再變而為殉名利……妄欲以虛名動世，最後才認識到“士生於世，當不徒以文章自見”，應該講求經世致用之道，“所望者中外輯和，西國之學術技藝大興於中土”。

古人所謂讀萬卷書，不如行萬里路，因為行萬里路可以增廣見聞，知別人之長，而始知自己之短。王韜思想之改變，實種因於歐遊，因為照王韜所說，中國與歐洲比較，其科技實相差一世紀，凡有熱血之中國人，睹此情形，當有所慚悚，而急起直追之心，亦



油然而生。這就是王韜思想改變的主要原因。

1870年，王韜由歐返港。最初兩年，他輔佐理雅各譯事之餘，還編著《普法戰紀》一書十四卷。

普法戰爭發生於1870年至1871年1月，普魯士（即後來之德國）首相俾斯麥利用西班牙王位繼承問題，蓄意對法國挑釁，7月10日，法國向普魯士挑戰，大戰於焉爆發。結果，法國大敗，法皇拿破侖三世、法國元帥及三十九名將軍連同十萬名官兵都當了俘虜。

此役後，俾斯麥聲名大噪，有“鐵血首相”之稱。

從王韜著述《普法戰紀》中可知他對歐西歷史、地理之深有研究，同時，對俾斯麥的合縱締交的手法，更有詳細的分析，可以說，《普法戰紀》不只是史書，還是政治課本。

王韜三十四歲，時為1862年，距香港被割讓予英亦二十年。當時的香港是怎麼樣？王韜撰有《香港羈蹤》一文，且把它轉錄如下：

……………庚辛之間（庚申、辛酉之間，即咸豐十年，公元1860—1861年間），江浙淪陷（即被太平軍佔領），時局愈危，世事益棘，滬上一隅，風鶴頻警。秋初，老母棄養，余硯田久涸，本思鋤口於遠方，兼以天譴司命，語禍切身（即被指上書太平軍一事），文字之崇，中或有兒，不得已蹈海至粵，附“魯納”輪船啟行，時，同行者為江寧范春

泉祖洛，其弟鏡秋，蕭山魯荻洲希曾，並其友許識齋，與作清談，頗不寂寞，每話亂後景況，為之鼻酸。

舟行兩晝夜抵福州，泊羅星塔，兩岸重崖，山氣蔥蒨。閩省多山，城堞皆依山而築，惟漳州平地較多。閱日抵廈門，市集頗盛，翌日午後抵香港。山童赭而水泊？，人民椎魯，語言侏儻，乍至幾不可耐。余居在山腰，多植榕樹，窗外芭蕉數本，嫩綠可愛。既夕，挑燈作家書，隔牆忽有曳胡琴唱歌者，響可遏雲，異方之樂，祇令人悲。

香港本一荒島，山下平地，距海祇尋丈，西人擘劃經營，不遺餘力，幾於學精衛之填海，效愚公之移山，尺地寸金，價昂無垠。沿海一帶多開設行舖，就山曲折之勢分營三環，曰上環，中環，下環，後又增為四環，俗亦呼曰“裙帶路”，皆取其形似也。

粵人本以行賈居奇為尚，錐刀之徒，逐利而至，故貿易殊廣。港民取給山泉，清冽可飲，鷄豚頗賤，而味遜江浙。魚產鹹水多腥，生魚多販自廣州，閱時稀久則味變。上中環市廛稠密，閭閻宏密，行道者趾錯肩摩，甚囂塵上，下環樹木茂盛，綠蔭繽紛，遠近零星數家，有村落間意，薄胡林（即今日之薄扶林）一帶，多西人避暑屋，景物幽邃，殊有蕭寂之意。下環以往，漁家蛋戶大半棲宿於此。

中環有“保羅書院”，上下交界有“英華書院”，上環有“大書院”，皆有家子弟肄業，教以西國語言文字，造就人才，以供國家用。……

上環高處為太平山，兩旁屋宇參差如雁翅。碧窗紅檻，

畫棟珠簾，皆妓女之所居……其有所謂“鹹水妹”者，多在其中，類皆西人之外室，港中近日風氣，亦尚奢華……一席之貴多至數十金，笙歌徹夜，繁華幾過於珠江。

我們從王韜此文，一方面可以看到他的文才，而另一方面，又能知悉百多年前香港的一點景況。

此外，王韜編著的《普法戰紀》出版後，在日本極為暢銷，也引起該國朝野人士的注意，蓋其時日本正銳意求新，該書乃成為日本知識分子瞭解世界大勢的必讀之書。

1870年，王韜由歐返港，曾往遊日本，時間為1878年（光緒五年閏三月初七日），到是年7月15日，歷時達四月有餘，在此期間，他逐日記載這次中日文化交流的盛事，並出版《扶桑遊記》，該書亦大受日本朝野注意。

這時，王韜年已半百，賭酒徵歌早就毀壞他的健康，“往往風雨一廬，未秋先病”，壯志漸不如前，生活更加靡費，他在日本時，酒色徵逐，竟無虛夕。

1937年7月，在上海出版的《逸經》雜誌，有一篇訪問王韜內侄孫楊君所撰的《長毛狀元王韜》的文章。

世傳王韜為太平天國的狀元，可能因此而以訛傳訛，該文冠以“長毛狀元”之狀元，可能是指太平天國統治下之有學問之人，而並非科舉時代之狀元、探



花、榜眼之類，猶之乎今日香港報章稱會考獲六優一良或七優之學子為“本屆會考狀元”一樣，蓋王韜於十七歲時中了秀才，第二年再考舉人，即未考中，自是放棄功名。

孫楊君在《長毛狀元王韜》一文中，這樣寫道：

他（指王韜）的體態臃腫，貌亦不揚，復因屢受環境的刺激，致成早衰，三十五歲以後，便已目矇齒腐，面皺髮稀，所以並不似我們想像中的“金馬玉堂”的風流人物，但好色的憧憬，老而彌篤，這也可見他生活的畸形了。

這是王韜的聲色犬馬生活的一面，但其歐遊，東遊見聞及所發表的見解，則確有見地，猶為日本維新分子所重視。

在一八七一年（同治十年），香港英華書院停辦，王韜乃與黃勝（曾與伍廷芳合辦香港第一份中文報《中外新報》，梁仁甫等集資承購印刷設備，設立“中華印務總局”，並於一八七三年（一說一八七四年）創刊《循環日報》。

王韜親任主筆，撰述時評，立論正確，被譽為“中國報界記者名聞世界的最早一位”。

1884年，王韜移家至滬，任《申報》編纂主任，翌年又創辦木活字印書館，1887年，出任上海格致書院掌院（即校長、院長）。到1890年，病死上海，享年六十二歲，而他在《循環日報》時間，也不過一兩年而已。



清末時期的香港報紙

清末時期的香港報紙

清末之際，在1911年時，香港的報紙有《中外新報》、《華字日報》、《中國日報》、《世界公益報》、《商報》、《維新日報》等多家，但各報設備，尚屬簡陋，報業人才亦少。當時香港的報社最着重者為主筆，而“社論”即為一報之靈魂，至於新聞，亦非常貧乏，所以銷路不廣，而告白（即廣告）更遑論了，加以當時洋紙相當昂貴，所以清末之際，香港報紙每日出紙最多者，也不過三張。

1911年的香港報紙如此，過去報紙出紙多少，亦可想而知。在1910年以前，香港報紙很多是每日出紙一張，能夠每日出紙兩張者，已是“大報”了。

我們翻開那時的報紙，廣告欄內，除船期告白外，其他如醫藥廣告一類者，僅西藥房及西醫生之告白二三家，到了後來，才有些其他商業性廣告。

到了1914年至1916年間，第一次世界大戰軍興，歐戰爆發，洋紙來源漸少，市價繼續高漲，較諸前時幾及三倍。即使各報迭議加收報費，但無奈紙市告絕，出版遇上重重困難。於是在1911年時，每日出紙三大張者，至是遂改為兩張半，繼且改為兩張。

到了1918年，歐戰告終，洋紙復源源而來，價錢

也漸復舊觀，於是有些報紙，為了爭取讀者，每日出紙竟多達四張者。

洋紙缺乏，售價飛漲，影響報紙業至大，在此情況下，報紙不得不減紙以應付難關。

過去，香港報紙每日所用之紙張，均由報社自購，百餘年來，亦有例外者，那就是在 1941 年聖誕至 1945 年“香港重光”期內，由於香港陷敵，香港又被盟軍封鎖，百貨來源困難，故在香港淪陷期間，報社所用紙張，曾由日本當局配給。

到了 1945 年香港重光後的第一年，報紙所用的紙也須由香港政府配給，因為那時市面紙張非常缺乏也。

這裏順便談談清末一份保皇黨的報紙《維新日報》的經過。光緒七年（1881），中法戰爭爆發，先是，法國入侵越南，原越南王阮福映，因傳教通商問題，與法國齟齬，在同治元年（1862）法國迫越南訂約後，又欲侵北圻，越南不允，同治十二年（1874），法又佔河內，時黑旗軍劉永福屯越，乃出兵抗法，斬法將。翌年，法交還河內，但又迫越南簽訂《西貢條約》，中國抗議無效。

光緒八年（1882），法再佔河內，翌年，我滇桂軍聯合黑旗軍劉永福再抗法，到光緒十年（1884）四月，李鴻章與法代表訂《天津條約》，條件為：（一）中國不過問法越條約，（二）法不索兵費，法在邊境通商。

在中法戰爭期間，香港報紙如《中外新報》、《華字日報》、《循環日報》，對於中法戰爭新聞，報導極為



清末時期的香港報紙

詳細，而港人對於戰事新聞，又極關注，所以各報銷路特暢。

當中法戰爭爆發時，有位陸驥純君，承辦《近事彙編錄》，業務至佳，惟物主羅郎公司（外商）倍加租值，陸君於是放棄《近事彙編錄》，以個人資本，另組《維新日報》。到光緒末年（1908），該報全盤頂予劉少雲，到宣統元年（1909），遂改名《國民新報》出版，到民國成立（1912），該報遂告停刊。

清末時，又有一份《粵報》，乃匯豐銀行買辦羅鶴朋，以個人資本所開設。羅之開設該報，乃因其戚馮孝廉擁有“時藝藍本”，欲排印成帙，以趁鬧市，遂商諸羅氏，欲以報館而兼營印刷業，羅氏乃斥資三萬元，於光緒十一年（1885），由馮孝廉署辦粵報，及延聘魏孝廉及同案秀士四人主持報務，並編輯書籍，翌歲適逢殿試，馮魏二人乃摒裝北上，報務乏人主持，而藍本排印，方及半數，而三萬元資金，已消耗殆盡，羅鶴朋不允添本，遂決定頂讓予人。

越年，有羅敬之君，集股三千元將粵報器材購得，經營三年，卒亦告停版。

計當時香港一般報人之薪酬大略如下：正主筆之薪金，每月不過二十元至二十五元，副主筆月薪則為十元左右，翻譯專任者則為二十元，兼職者則只有十元以下而已。不過，當時香港物價低廉，若在商行做事，則僅月入數元，有的甚至“有食無工”，或僅一二元月薪而已。